

张杰 著

韩国史料三种与 盛京满族研究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张杰
著

韩国史料三种与 盛京满族研究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© 张 杰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 / 张杰著. —沈阳: 辽宁民族出版社, 2009. 7

ISBN 978-7-80722-808-0

I. 韩… II. 张… III. 满族—民族历史—研究—沈阳市—1783~1829 IV. K28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7894 号

出版发行者: 辽宁民族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

幅 面 尺 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12 $\frac{7}{8}$

字 数: 300 千字

插 页: 1

印 数: 1-1 000

出 版 时 间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刷 时 间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 任 编 辑: 吴昕阳

封 面 设 计: 杜 江

责 任 校 对: 姚飞天

定 价: 35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345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33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张杰，1954年5月生于辽宁省丹东市。1978年入辽宁大学历史系，最后学历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，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高级研究学者。现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，沈阳市政府参事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乾隆帝》（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），《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》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），《满蒙联姻》（辽海出版社1997年），《清高宗·乾隆帝·弘历》（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），《辽河流域宗教文化》（辽海出版社2000年），《清代科举家族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），《和珅传奇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），《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》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），《满族要论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）等。

韩国一年 (代序)

2004年8月,我由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推荐,有幸成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“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”的受益者,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。2005年8月22日,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为国际交流学者举行的告别宴会上,我受中国学者的委托,并且代表他们的家属致感谢辞。感谢辞的结尾部分如下:

明天,37名中国学者将要陆续踏上归国的行程。《圣经》中说:看得见的是暂时的,看不见的是永远的。离别是暂时的,我们在这一年中结下的深情厚谊永存心中!我们向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庄严地承诺:每一名中国学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做好研究项目的后续传播工作;我们真诚地邀请: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所有工作人员到我们的单位参观做客!我们衷心祝愿,SK株式会社兴旺发达,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越办越好!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《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》,就是我在韩国所做研究项目“后续传播工作”的直接成果。本书的出版,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其他韩国学者的帮助密切相关,因此,愿将我在韩国的研究经历及见闻写在前面。

一、韩国高等教育财团

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隶属于 SK 株式会社，是一个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，坐落于首尔市繁华的江南区驿三洞，整个建筑是一座 11 层高的大楼。我们来自中国的 37 名学者到达韩国后，分别在不同的大学里从事研究工作，最经常见面的地方，就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这座大楼，大家都亲切地简称其为“财团”，把它视为中国学者的大家庭。因为财团不仅仅是研究经费的赞助者，它的工作人员还为我们适应在韩国生活，提供了热情、周到、真诚、细致的服务。

2004 年 8 月 30 日下午，当我走出仁川国际机场时，立刻感受到了财团工作人员的热情。国际学术部的金泽部长微笑着，迎接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交流学者，其他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将行李搬到财团的大客车上，将我们安排到事先准备好的宾馆住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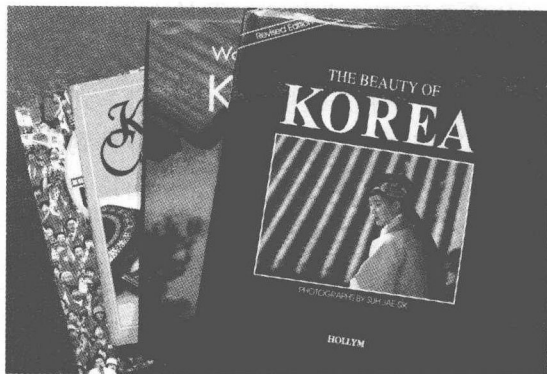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在财团举行了简短的见面会后，当月研究津贴和移动电话送到了每一位学者手中。那些已经联系好住处的中国学者，随即由财团派车送往他们的住地；尚未安置下来的学者，则由财团工作人员帮助租房子。我与其他几位研究单位在国立首尔大学的学者，在国际学术部康泰硕先生带领下，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就都找到了临时住处。我的住处是在新林九洞的山坡上面，整个房间约 15 平方米，租金是 30 万韩币（当时约合人民币 2400 元）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是自 2000 年财团实施“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”以来，康先生第 5 次到这里找房子，他已经非常熟悉中国学者的生活习惯，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大家满意的房子。

大约一星期过后，我得到通知，财团为各国学者准备的研究室已经分配好，可以随时使用。财团的 4 楼到 7 楼是研究室，整

个楼层分隔成方格状，按号码编排。我的研究室在5楼，号码是507，空间虽然不大，只有5平方米左右。但是配备了计算机、写字台、书柜、电话和衣架，每一层楼有一个共用打印机，最大的特点是功能齐全。这是我在高校20年教学科研中所使用的第一个私人研究室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。我最初与国内联系的电子邮件、最终研究报告、包括在韩国各大学的学术讲演稿，都是在财团研究室完成和打印的。

与研究室相配合的是图书馆，目的是为国际交流学者提供最基本的研究资料。图书馆设在一楼，藏书不多，颇具特色，主要是英文和韩文两种图书，还有少量的中文杂志。我注意到，经常有些社会人士到图书馆来看书和借书，可知该图书馆在为社会大众服务上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。由于韩国的历史文献多为汉字，使我成为图书馆的经常借阅者。

在韩国期间，我反复重点阅读的是两种韩国古籍，一种是《燕行录全集》，另一种是《韩国历代文集》，后一种书完全是在财团图书馆阅读的。通常我每次借出5册书，到研究室后沏上一



杯咖啡，便开始全神贯注其中，遇到有价值的史料，记下页码，待到图书馆还书时，便将事先记好的页码复印下来。在财团，喝咖啡和复印都是免费的，由于在国内习惯了收费服务，反而限制了我的复印数量，担心被图书馆工作人员视为好占公家便宜者。事实证明，我这种想法纯属多余，由于我经常到图书馆

借书，因而在离开韩国前被财团授予“图书馆利用奖”，奖品是4册英文图书。

为了方便国际交流学者在韩国的日常生活，加深对韩国文化的了解，财团还为我们提供免费的韩国语课程。在前几届亚洲学者的韩国语学习中，通常中国学者组成一个班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组成一个班，分别用中、英文授课。由于本年度的中国学者十分踊跃参与，因此组成了两个班。上课时间是每周的两个上午，9时开始，连续上四节课。负责中国班教学的李铮老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，毕业于国内中央财经大学外语系韩语专业，当时在国立首尔大学读影视专业的研究生。李老师年轻而富有教学经验，刚开始几周学习语音，随后进入正式的语言学习。她的授课内容主要分成四部分：一是讲解每课的单词，二是带领大家念课文，三是每个人分段落读课文纠正发音，四是用新学的单词造句。由于我们这些学生的特殊身份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），课堂上每一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，原以为漫长的四节课学习时间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。

韩国人作息时间效仿欧美国家，上午9时开始工作，学校、工厂、机关、商店都是如此。由于到财团上课，使我加入了首尔市上班族的行列，通常7时20分离开住所，先乘公交车到达地铁新林站，转乘2号线地铁到驿三站下车，再步行5分钟到达财团。时值交通高峰，我目睹了韩国人的井然有序，从山顶乘公交车两三个人的自觉排队，到出地铁口转乘多条公交线路上百人的交叉排队，以及在地铁站内的几十条排队人群，从未见过有人试图“加塞”的现象。公交车和地铁中的老弱病残座席，不会有青壮年赖在上面，即使乘车高峰时刻也往往空无人坐。像我这样的年龄，虽然没有人会给我让座，但在座位上的韩国人会主动示意，让我把手提包交给他们拿着，使我尽可能站得舒服一些。

下课时间是午后 13 时，通常中国学者会一起到餐馆用餐。韩国的公共饮食业非常发达，绝大部分饭店在韩国语中都叫做“食堂”，里面一般只供应大米饭、面条和几样固定的菜肴。财团附近有不少食堂，各大公司的职员们几乎都在里面用餐。我们最经常去的两个食堂，一个里面的主菜是沙锅炖骨头汤，另一个里面的主菜是炖青鱼或肉汤，同时都配有白菜、萝卜制成的泡菜，每份价格在 5000 韩币左右（当时约合人民币 40 元）。如此简单的饮食，使 AA 制成为可能。吃饭只是生存的需要，因此占用的时间越少越好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，才使首尔市的“食堂”遍布大街小巷。

在韩国的一年里，除了节假日外，我几乎风雨不误，坚持去财团上韩语课。临回国前，中国班的学者不仅学完了预定的两册教材，而且加学了第三册教材。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效果，除了李铮老师的授课有方之外，还要感谢财团为我们精心选择的教材和配置的磁带。韩国语教材的课文，全部采用英文注释，使我们轻而易举地理解了课文的内容，磁带标准、清晰悦耳的读音，变成随时在身边的老师，加快了掌握韩国语的速度。在结束课程时的韩国语演讲比赛中，我还获得了三等奖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韩国语的学习，密切了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、中国学者和财团之间的联系，进一步增进了对当代韩国社会的了解。

由全体亚洲学者共同参加的集体活动，是财团精心安排和组织三次韩国文化旅游。当枫叶红遍群山的深秋，我们前往韩国东南部庆尚道地区进行第一次文化旅游，参观了庆州的大陵苑、石窟庵、佛国寺、瞻星台、雁鸭池等新罗王朝留下的著名遗址。在风和日丽的春天，我们游览了韩国中部的忠清道地区，拜谒了藏有佛祖真身舍利的通度寺，以“百济的微笑”而闻名的瑞山摩崖三尊佛像。正值盛夏的梅雨时节，我们到达了韩国东海岸的江陵道地区，感受了雪岳山的雄浑奇伟，五台山的秀美苍翠，洛山

寺火后犹存的老松，月精寺的金碧辉煌，江陵市博物馆的乌竹轩和船桥庄等名胜古迹。这些活动，极大地加深了来自亚洲各国的学者对韩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。

在这些文化旅游活动中，有两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

一件事是参观 SK 株式会社设在蔚山市的炼油厂。整个厂区面积有数百平方公里，驱车几十分钟行驶其间，到处都是密如蛛网的粗大管道，却没有看到一个操作工人。我们 60 余人乘坐的两辆豪华大客车停在工厂的接待室前，走出来接待全体亚洲学者的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士。进入接待室坐下之后，不知何种原因，我很荣幸地被选中代表全体学者签字留念，并因此与这位女士用中文简短交谈，得知她的汉语是在辽宁学习的。财团的具事务长对炼油厂致感谢辞后，她分别用娴熟的中文和英文致欢迎辞，随即播放一部介绍炼油厂的纪录片。时间大约 20 分钟左右，我们已经走出了接待室，她登上我们乘坐的大客车，在车的行进中介绍路过厂区的具体情况。在离开工厂区时，她下了车，说一会儿搭过路车回去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谁会相信整个外国参观团的接待工作是她一个人？人员的精干换来的是丰厚的利润，作为韩国最大的炼油厂，职工总数不过 1600 人，当年炼油能力是 1600 万吨，平均每人炼上万吨油，其产值又是何等的巨大！

另一件事是男子足球比赛。参观东海岸期间，在我们临时住所的沙滩上举行了这场比赛。参赛双方分别为中国队和亚洲联队，中国学者多达 37 人，人数上占优势，亚洲学者只有 13 人，但队员年纪较经，加上财团 6 名工作人员编入联队，体力上有明显优势，因此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。比赛开始不久，中国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，场上队员年龄偏大，很多人在场上越跑越慢，以金泽部长为首的联队加快进攻速度，1 比 0 领先。面对不利情况，中国队充分展现了博士们的智慧和团结。大家迅速发现，年纪较轻的王进斌博士球艺出众，主动形成以他为中心的进



参加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春节招待会的学者合影

攻战术。除了我和王鸿生教授年过5旬，与其他女士充当拉拉队员之外，场上队员一旦跑不动，立即有人上场替换，以保持相对的速度。由于场上队员的全力配合，最终王进斌博士一

人攻入两球，中国队转败为胜。

事后，据金泽部长说，这是五届财团举行的亚洲学者足球赛中，中国学者队唯一的胜利。胜利固然使人高兴，更让人高兴的是，这次比赛极大地加强了亚洲学者之间的友谊，在车里，原来的对手都主动坐在一起用英语交谈起来，后来许多人变成了好朋友。

二、接待学者吴教授

按照“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”的规定，每位学者在韩国进行学术研究期间，需要有一位“接待学者”对其研究课题给予协助，以保证课题的顺利完成。我的接待学者是国立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吴金成教授。吴教授早年留学日本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，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经济史，因此娴熟中文。记得第一次打电话，我说的是不大熟练的英文，吴教授说中文，一下子就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切起来。

吴教授的名片上面印着三行字：

国立首尔（汉城）大学校

人文大学 东洋史学科 教授

文学博士

名片上面字数不多，没有什么行政职务，突出地反映了韩国的大学体制，明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“国立”。韩国大致有 150 所大学，唯一能在校名前面加上“国立”两个字的就是首尔大学，还有 9 个“道立”大学，余下的基本是私立大学。“国立”不但意味着大学由韩国政府直接管辖，教职员工纳入国家公务员编制，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政府经费投入，高水平的教授队伍，低廉的入学费用，保证了学校在韩国高等院校中的绝对领先的学术地位。据说排名第二的学校有时会发生变化，诸如高丽大学、世宗大学等名校，首尔大学总是毫无争议地位居榜首。此外，首尔市内有一所大学也叫首尔大学，两者地位相差悬殊，“国立”两个字，在韩国是万万不能省略的。

二是综合性。韩国的大学称为“大学校”，校长称为“总长”，院系称为“大学”，负责人称为“大学长”。这种称呼上的区别，体现了韩国大学综合性的特色。例如，国立首尔大学设置工学院、理学院、化学学院、人文学院、经济学院、法学院、外语学院之外，还有商学院、农学院、医学院、艺术学院、社会科学学院等“大学”。吴教授工作的“东洋史学科”，相当于国内的系，与文学、史学和哲学等学科，都隶属于“人文大学”。不仅是国立首尔大学如此，连我访问过的一所教会大学，位于全罗北道益山市的圆光大学，也都设有工学院、农学院、医学院和美术学院。

三是学术性。“文学博士”和“教授”，折射出的是学术本位，在韩国要想在大学里面当教授，首先必须取得博士学位。在韩国，除了国立首尔大学和 9 个道立大学由政府投资之外，其他大学基本上是私立大学，所以不存在行政级别。通常校长由全体

教授选举产生，自然形成了学术本位制度。“大学长”平时的主要工作是为教授服务，为他们争取研究经费，改善研究室工作条件，被视为苦差事，没有教授想争当，只好采取轮流办法。据一位在高丽大学的中国学者告诉我，接待他的韩国学者时任法学院负责人，给这位中国学者画了一幅金字塔，说他在塔底下，其他教授都在上面。学术性最明显的表现是图书馆，不论节假日，还是寒暑假，一律开放，只是“节日”比“平日”的时间短一些而已。

吴教授中等身材，待人热情而又直率。第一次见面，亲自到校门迎接，体现的是热情；交谈中他告诉我，在韩国称呼别人“教授”远比“先生”合适时，展示的是直率。当得知我的研究课题属于中韩关系领域，吴教授便坦诚相告：他对这个课题缺少研究，但是愿意介绍韩国相关研究的专家，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尽可能的帮助。

韩国的大学教授，几乎每天都在自己的研究室工作。吴教授在我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，主动在哲学系科为我安排了一间研究室。为我提供研究室的宋荣培教授，是吴教授多年的老朋友。他告诉我：吴教授所在的东洋史学科，已经没有空闲研究室，于是找到他帮忙。恰好他们那里有一个研究室，由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博士使用，我们两人在一起，还可以互相交流。他带我交了5000韩币押金领取钥匙，打开房间后，里面大约有20平方米左右，计算机、电话、空调设备俱全。两个书架中的一个，摆放了许多中国文学书籍，宋教授告诉我，另一个空书架归我使用。这样，我在首尔大学也有了研究室。以前，我在首尔大学借书后只能带回住所阅读，如今直接带回研究室，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用餐，极大地便利了研究工作。

2004年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我随吴教授乘地铁去高丽大学，参加韩国明清史学会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。会议中间休息

时，吴教授说要介绍我与梨花女子大学校的崔韶子教授见面，因为崔教授是研究明清中韩关系史的专家。当他向我引见这位女教授时，我突然发现与她似乎见过面，经过交谈证明确实如此。在1996年10月，我应韩国城南市政府邀请，参加“纪念南汉山城筑城3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”。在大会上，我作了题为《“丙子胡乱”和朝鲜三学士》的学术报告，崔教授作为韩国方面的评议人，对我的学术报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会后，我们还互相赠送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。我们都非常感谢吴教授，创造了在高丽大学再次相逢的机会。后来，我两次去梨花女子大学拜访，受到了崔教授的盛情接待，她的研究助手宋美岭、郑惠仲研究员，为我提供了许多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对我完成课题帮助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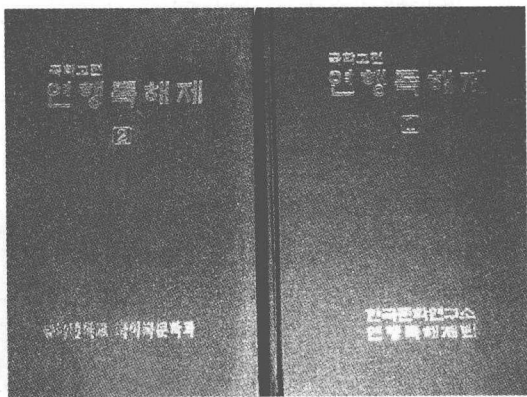
吴教授还想方设法为我与《燕行录全集》100卷的编者、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取得了联系。明清时期，朝鲜王朝几乎每年都派出外交使团前往北京，留下大量日记体的史料，被统称为《燕行录》。1993年夏天，我在吉林省延边大学调查明清东北史料时，第一次听说到《燕行录》文献的存在。后来得知，被中国清史学术界视为重要史料经常引用的朴趾源《热河日记》，不过是几百部《燕行录》之一种，开始关注中韩学术界对《燕行录》的研究。2001年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的《燕行录全集》，是我此次在韩国从事研究的基本史料，每天读书其中，更加萌发了与林基中教授见面的愿望。为此，我曾经利用在东国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之机，主动拜访林教授，但被告知，他已经退休了。于是，只好再请吴教授帮忙。由于林基中教授研究领域是韩国“国文学科”，又离开了学校，吴教授费尽周折联系，终于确定了见面的时间。

2005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和吴教授分别从自己的住所出发，前往现代百货店在江南区的分店。林基中教授将地点定在五

楼的一个餐厅，时间是上午 11 时。我先到达五楼，随后吴教授也到了，带我走进里面靠近角落的餐桌，坐在那里的林基中教授，面带笑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。吴教授简单地介绍了我的研究状况后，由于林教授不能讲中文，我把即将发表的“《燕行录全集》若干编纂问题之商榷”呈他指正。林教授认真阅读之后，说这是自《燕行录全集》公开出版以来，他所见到对文献本身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论文，将会慎重地考虑我的意见，希望我们饭后到他家里再谈。

林教授的家，实际上是他的工作室。距离现代百货店约十分钟路程，一处住宅楼的三楼，门牌号码旁边赫然写着“韩国文学研究所”七个汉字。进入屋内，大约有四五间房子，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书籍，据林教授说，共计两万四五千册。其中一个大房间，是林教授会客和工作的地方。房间里除了四周的书架之外，在醒目的位置上单独有一个书架，里面摆放的是《燕行录全集》100 卷，以及林教

授撰写出版的其他著作。我在交谈中，详细请教了《燕行录》的存世情况，林教授说，除了已经出版的 300 多种外，他还掌握 150 余种，准备择机出版，如果我研究需要利用，愿意以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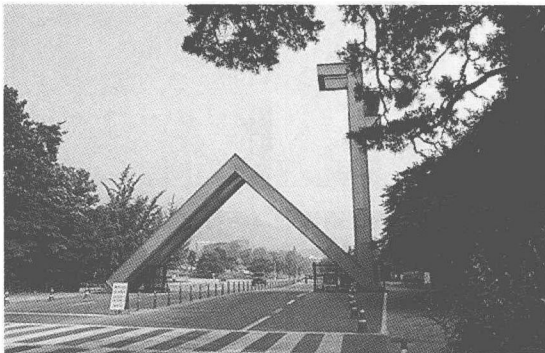
林基中教授赠送的《燕行录研究》书影

何方式提供给我。最后，我表示愿意将《燕行录全集》介绍到中国。告别时，我将自己撰写的《清代科举家族》一书送给林教授，他也将新出版的《燕行录研究》两册送我。

2005年6月30日，我应邀参加韩国明清史学会“夏季学术大会”，会议地点在全州市内的朝鲜大学。第二天上午9时，我在大会上作了“《燕行录全集》若干编纂问题之商榷”的学术报告，引起了与会韩国学者们的热烈讨论。会议休息期间，吴教授向我告别，说他的事情很多，就不听下一场报告了。因为开会那两天恰好下大雨，许多年长的教授都没有到会。吴教授乘车数百公里来到全州，听完我的报告，未等到中午即匆匆而回，体现的是不仅是对我个人，也是对中国学者的极大尊重。每当想起这件事情，我都非常感动。

三、读书在国立首尔大学

国立首尔大学主校园坐落在冠岳山公园的山坡上，一幢幢教学楼依山而建，到处都是绿色的草坪和高大的树木，环境十分优美。漫步校园之中，可以感受一年四季的变化。春天粉红色的樱花盛开，夏日白色的槐花竞相怒放，秋季里白果树叶泛黄，枫树叶子透红，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到了冬天，虽然到处银装素裹，由于周围山上有大片的松树，绿色中现出勃勃生机，毫无凋零之感。



国立首尔大学正门

整座校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是位于山脚下的学校正门。作为韩国最著名的大学，它的正门既非古代的宫殿建筑，也不是几层楼高的现代建筑，而是几个简易

黄色旧钢铁框架组成的韩文“首尔”字形。铁门两旁没有任何建筑，也没有收发室，看不见站岗的保安人员，甚至连个校牌子也没有。每天早晨，能看到十几辆首尔大学的校车，川流不息地进出学校，把学生们送到校园内各个教学区。中午和晚上下课后，校车又把学生送回他们的住地。除了校车之外，还有多路公共汽车，通往校内主要教学区，使学校成为一所完全对社会开放的大学。

由于乘坐校车完全免费，在首尔大学的周围形成了几个大的学生居住区，我所居住的新林九洞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的住所在山上，步行到学校正门的距离，大约有 30 分钟的路程，从正门到我在人文大学的研究室，还要走 15 分钟。最初，我乘公交车到正门下车，后来知道山下就有免费校车车站，便步行 10 分钟乘坐校车，5 分钟车程就到校内中央图书馆站下车，再步行 5 分钟到研究室，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时间。除了早、午、晚高峰时间外，平时 10 分钟左右就有一班校车，即使是在假期，也有校车通往校内，但是有固定时间限制。乘坐校车的手续十分简便，出示首尔大学的任何证件都可以，我由于年纪的关系，刚开始还向司机出示证件，后来和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一样，上车向司机问好而已。

韩国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，除了到财团学习韩国语之外，我都用在阅读国立首尔大学的藏书上面，而且在这里的图书馆读书，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记忆。由于喜欢读书，我才选择大学教师这个职业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因为大学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有永远看不完的新书。然而，目前国内有些地方图书馆的楼越盖越大，书架越来越漂亮，能够借阅的书却越来越少了。

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图书馆里特设的阅览室是专供读者读书的地方。我经常在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读书的地方，是它的开架书库。开架书库的主要功能是外借图书，读者凭借书证进入书